

IDEOLOGICAL SECURITY

INTERNET

互联网时代 中国意识形态安全 问题研究

陈中奎 著

ERA

RESEARCH ON IDEOLOGICAL SECURITY OF CHINA IN THE INTERNET ERA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互联网时代 中国意识形态安全 问题研究

陈中奎 © 著

RESEARCH ON IDEOLOGICAL SECURITY OF CHINA IN THE INTERNET ERA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互联网时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 / 陈中奎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7

ISBN 978-7-5201-4487-2

I. ①互… II. ①陈… III. ①意识形态-研究-中国
②国家安全-研究-中国 IV. ①B27②D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47422 号

互联网时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

著 者 / 陈中奎

出 版 人 / 谢寿光

责任编辑 / 罗卫平 袁卫华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010)5936721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0.75 字 数：143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4487-2

定 价 / 9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意识形态安全对于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意义不言自明，尤其是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随着互联网逐渐成为影响我国安全的最大变量，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严峻。

尽管互联网时代影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主要因素来自网络，但冷战结束以后，西方敌对势力采用的传统意识形态渗透模式和内容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只是载体和形式以及手段在互联网时代出现了新的变化，所以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渗透内容和目的与现代的渗透手段相互叠加，线上斗争与线下斗争相互交织，要求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有新的认识，并在手段和方法上对来自网上和网下的挑战有新的应对之策。

从学术界已经出版的专著和发表的论文来看，关于意识形态安全的认识还存在一些不够准确的地方。不少学者将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等同于意识形态斗争问题，谈到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就指向如何有效开展意识形态斗争的问题，我认为将意识形态安全概念等同于意识形态斗争的概念是欠妥当的。安全是一种状态，斗争只是众多状态中的一种，所以前者的内涵应该包括后者。对概念理解存在误区，造成一些学者对影响意识形态安全的因素大多只是从斗争角度思考，忽略了意识形态理论建设这一角度。

本书以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指导，在吸收现有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准确把握意识形态安全概念，全面分析影响意识形态安全的复杂因素，进而提出核心观点，

意识形态安全包括发展性安全和竞争性安全，而竞争性安全又可以分为敌对性和包容性两种。

发展性安全的提出主要立足点是，当我国意识形态没有受到外部势力的干扰和侵害时，能够始终保持创新发展态势，成为广受人们认同并能引领新时代中国政治实践的行动指南。竞争性安全的提出主要针对的是，当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受到外部势力的威胁时，能否在与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国内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竞争中取得胜利，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一种是敌对性的，斗争的结果是要“赢”；一种是包容性的，斗争的结果是要“主导”。

本书的整个结构和行文都是围绕上述核心观点展开，初步建构研究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理论框架，从时代维度、中国维度和世界维度深刻阐明互联网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重大意义。之后，以理论阐述为基础，以现实问题为目标，拓宽视野，放眼整个国际互联网时代，把握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演变的特点，进而遵循从一般到特殊的研究方法，分析互联网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最后一部分，提出如何牢牢掌握互联网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战略主动权的对策措施，其中涵盖树立正确的意识形态安全战略观、构建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机制等五个方面内容。由此，形成研究互联网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完整逻辑。

笔者尽力夯实理论基础，完善理论分析框架，力求准确客观概括出互联网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态势，并提出合理的对策措施。但关于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研究还远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此项课题研究并不因书稿的完成而完结，一些问题的探究只是借助课题打开了一扇窗，至于那扇窗户里更多的情况，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究。我期待本书能够为学界同人提供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和启发，能够为宣传思想战线贡献绵薄之力，也期待我能够将此项课题做深、做细、做出更多成果。

目 录

导 论	001
第一章 互联网时代维护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	019
一 基本概念界定	019
二 互联网时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体系的基本构成	025
三 互联网时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结构层次	029
第二章 互联网时代维护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重大意义	031
一 时代维度：关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	031
二 中国维度：关乎中国总体国家安全	033
三 世界维度：关乎世界社会主义生存发展	037
第三章 互联网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演变特点	042
一 打破传统国家边界，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热点由局部向全球扩散	042
二 西方认为自身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单向输出者，非西方国家开始向其倒灌意识形态	045
三 社交媒体在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升级过程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049

四	青年始终是意识形态斗争双方争夺的重点对象·····	052
五	行政管控不再是应对意识形态安全风险之长久之策，引导网络舆论成为亟须提高的能力·····	054
第四章	互联网时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风险挑战·····	059
一	发展性安全风险·····	059
二	竞争性安全风险·····	070
第五章	牢牢掌握互联网时代维护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战略主动权·····	089
一	树立正确的意识形态安全战略观·····	093
二	构建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机制·····	101
三	采取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有效防御措施·····	106
四	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116
五	提升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	125
参考文献 ·····		155
后 记 ·····		162

导 论

意识形态是政治实践的理论指引，是政权合法性的重要依据，也是人民大众的行为准则。任何一个国家、政党、社会组织都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工作。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① 当世界进入互联网时代后，网络技术作为当代最发达的信息传播技术，改变了舆论宣传的格局，为我国意识形态的发展、传播既提供了机遇，又带来了挑战，传统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认知亟待更新，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方法手段也亟待调整。习近平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搞不好会成为心头之患，“西方反华势力一直妄图利用互联网‘扳倒中国’，多年前有西方政要就声称‘有了互联网，对付中国就有了办法’，‘社会主义国家投入西方怀抱，将从互联网开始’”^②。因此，研究互联网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研究目的

关于“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属于政治学传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第35页。

^②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第28~29页。

研究领域。“互联网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课题是将传统研究课题与新的时代特征相结合，试图阐述清楚：相对于前互联网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呈现的新变化；在互联网时代不断向纵深推进的大背景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动态性风险和挑战；以理论分析框架为指导，研究互联网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对策措施。具体研究目的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

一是理论层面的目的：进一步丰富现有意识形态安全相关理论研究成果。首先，深化对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重要意义的理解和把握。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意义，既有普遍性意义，也有特殊性意义，现有的意识形态安全理论对普遍性意义阐述比较全面，但对不同国家、不同政党、不同社会共同体维护自身意识形态安全意义的特殊性研究不够，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重大意义的阐述不够全面，本书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不足。其次，搭建分析互联网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分析的理论框架。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为指导，尤其是以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意识形态安全”等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指导，构建意识形态安全理论分析框架，奠定整个课题研究的理论基础，而不是简单搬来上述相关理论作为研究的分析工具。最后，初步提出互联网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基本范式。^①互联网技术发展推动的信息革命将对意识形态安全提出越来越多的挑战，产生越来越深的影响。本书的一个重要理论层面的目的就是希望对互联网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研究形成一个基本合理的逻辑范式。

二是实践层面的目的：提供应对当下意识形态安全挑战的对策

^① 范式 (paradigm) 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著名科学家哲学家托马斯·库恩 (Thomas Kuhn) 提出并在 1962 年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系统阐述的。它指的是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集合；运用于科学研究领域，指的是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事件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

思路。互联网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性课题，需要从理论层面回答相关概念内涵外延、研究思路方法等，还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现实性课题。具体要研究解决的实践性重点难点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弄清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具体状况。对互联网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研究，主要难点在于对安全风险状态的准确把握，本书以理论分析框架为指导，对互联网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演变特点进行研究，以此为基础，区分风险等级、风险类别，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存在的风险挑战进行较为客观准确的归纳和梳理。另一方面是提出理论上行得通、实践中可借鉴的对策措施。依据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构成要素，针对互联网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风险表现出的多种新情况新问题，从多个角度提出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对策措施。

二 研究现状

伴随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信息传播速度获得极大提高、传播平台获得无限延伸，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逐渐面临与前互联网时代风险相区别的新状况。互联网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是我国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需要面对的重要时代课题。在收集整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书从意识形态安全内涵、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意义、互联网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风险以及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对策措施四个方面，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勾勒出研究的大致脉络和总体状况。

（一）国内研究现状

1. 意识形态安全内涵的相关研究

意识形态安全内涵的界定直接关联本书整个研究的立足点和切

入点，弄清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是研究互联网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前提，对于如何解释和界定意识形态安全，学术界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四种。

一是从状态论的维度进行概括，把意识形态安全看作一种不受威胁的相对稳定的状态。目前学术界相关的研究成果中，赞同状态论的居多。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石云霞认为，意识形态安全“就是指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形态体系不受威胁、没有危险、免遭危害，能够维持正常生存和发展的一种相对稳定与有序和谐的状态”。^①持类似观点的学者不在少数。如徐稳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一个集团、政党或国家意识形态的生存和发展免受危险或者威胁的状态”。^②殷豆豆提出，意识形态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指导思想、政治意识形态处于稳定的状态”。^③也有学者对这种状态论做出进一步延展，提出“现在的意识形态安全已经不能固守静态的无危险的状态，而要追求一种保障安全状态有序运行的配套机制”。^④

二是从功能论的维度进行探讨，把意识形态功能的正常发挥等同于意识形态安全。如季正矩、王瑾指出，意识形态安全是“民族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基础，是民族的黏合剂。它能维护政权的合法性，统率着全体社会成员的整体行为，进行大规模的政治动员，具有强大的政治功能”。^⑤张焱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指统治阶级的意识形

① 石云霞：《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中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2年第2期。

② 徐稳：《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理论学刊》2013年第2期。

③ 殷豆豆：《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路径》，《光明日报》2015年12月2日，第13版。

④ 夏一璞：《互联网的意识形态属性》，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5，第65页。

⑤ 季正矩、王瑾：《国家至要——当代国家政治安全新论》，重庆出版社，2006，第4页。

态能够在一国意识形态体系中保持统治或主导地位，能够有效规避或应对由社会政治变迁所引发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危机’”。^① 再如张筱荣、王习胜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能够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保持自身结构上的稳定，能够发挥正常功能并免遭来自内部或外部异质意识形态因素的侵蚀、破坏或颠覆，确保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能够得到国内外的广泛认同”。^②

三是从构成论的维度进行阐释，把意识形态安全分解成涵盖各种要素的安全。李晓燕认为，意识形态安全“主要包括指导思想安全、政治制度安全、政治信仰安全、道德安全等内容”。^③ 郭明飞认为，意识形态的安全主要是“社会指导思想的安全、社会政治信仰的安全、社会道德秩序的安全、民族精神的安全”。^④ 也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安全包括“指导思想的安全、政治信仰的安全、道德秩序的安全和民族精神的安全等4个方面内容”。^⑤ 这一角度的不同见解主要取决于对意识形态结构要素理解的不同。

四是从实质论的维度进行剖析，把意识形态安全看作对主流意识形态价值主张的认同和践行。赵欢春认为，意识形态安全的实质“是政治安全，是能否坚持和完善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⑥ 冯宏良认为，意识形态安全的实质“就是巩

① 张焱：《道器并重：当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3期。

② 张筱荣、王习胜：《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揭示及与其他安全的关系辨析》，《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③ 李晓燕：《大数据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思考》，《党建研究》2017年第6期。

④ 郭明飞：《网络发展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143页。

⑤ 张筱荣、王习胜：《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揭示及与其他安全的关系辨析》，《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⑥ 赵欢春：《“总体国家安全”框架下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预警探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11期。

固一个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合法性，即意识形态安全在根本上体现为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内在价值主张的高度认同感和自愿践行”。^①

上述四种观点分别从某一角度反映了意识形态安全的特征，都不够全面严谨。状态论的观点认同度较高，但这种把意识形态安全当作一种免受或者不受威胁状态的界定不够周延准确。应当看到，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长期对立共存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意识形态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不存在不受威胁或者免受威胁的状态，实际中的安全状态应该是在不断应对风险、挑战和斗争中赢得的。持功能论观点的学者相对少些，这种观点的不严谨之处在于把意识形态的功能等同于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没有认识到不能将两者简单画等号，前者只能是后者外延的一部分。构成论的不足在于没有从整体上对内涵进行把握，而是把整体变成了部分，用各个部分安全内涵的简单组合代替整体安全的内涵，显然不妥。至于实质论，没有处理好抽象与具体的关系，对意识形态内涵进行高度抽象，省去了其中具体明了的部分，使得内涵的界定不够全面和准确。

2. 维护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重要意义的相关研究

我国对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大致是从2000年开始的。从中国知网数据库检索情况来看，2000~2011年，相关研究成果呈现缓慢增长的态势。2012~2014年，尤其是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之后，此类研究成果才不断丰富，出现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2015年至今，关于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研究成果，无论在增长幅度上，还是在研究深度上，都有较大提高（见图0-1），但从总体来看，与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安全问题的严峻形势相比，还远远不够。关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重要意义的研究大概可分为三个阶段。

^① 冯宏良：《意识形态安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索》2010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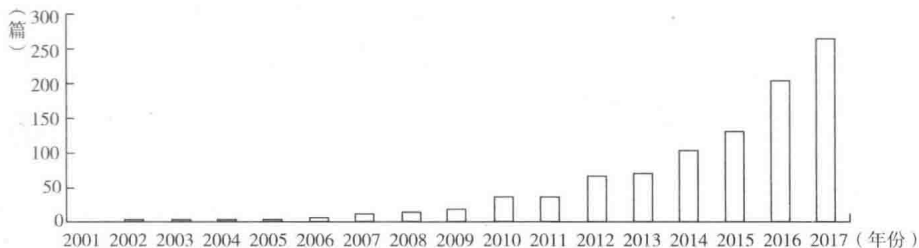


图 0-1 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数量分布

第一阶段：2012 年以前。党的十八大之前，在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有关研究成果中，很少单独论述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意义。学术界普遍的共识——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无须多费笔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并不遥远。所以，这个阶段的研究成果关于意义部分顶多几笔带过。比如张骥、张爱丽提出，意识形态安全“对维护国家政治稳定、保障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①

第二阶段：2012~2014 年。2013 年 8 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对意识形态工作做了明确指示和要求，推动了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热潮的兴起。这个阶段的研究成果较多地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简称 8·19 讲话）中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的论述为指导，进一步阐述了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由于理论研究是阶段性和长期性的统一，一些理论成果在时间上延伸到了 2014 年之后。如张国祚指出，“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国家兴亡盛衰，忽视不得”。^② 夏自军认为：“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是

① 张骥、张爱丽：《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社会主义研究》2007 年第 6 期。

② 张国祚：《怎样看待意识形态问题》，《红旗文稿》2015 年第 8 期。

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①也有学者把综合层面的意义问题进一步落实到具体层面。如颜旭指出：“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意识形态安全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它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国家长治久安。”具体而言，意识形态“事关社会制度安全，事关国家安全，事关执政党执政安全”。^②

第三阶段：2014年至今。2014年4月，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此后，学术界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重要意义问题的研究，逐渐从总体国家安全观角度切入。如张焱指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当代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③夏一璞指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预警器。^④也有学者不断深化研究，从意识形态安全与政治安全、文化安全、网络安全等相互关联角度，阐述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意义。如江涌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政治安全的核心。^⑤侯惠勤认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⑥还有的学者从国家安全内涵转型的角度，阐述了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意识形态安全的突出地位。如赵欢春指出，随着安全观的时代嬗变，意识形态安全由“传统安全领域”进入“非传统安全领域”，凸显出我国国家安全形势变化的新特点、新趋势。^⑦

① 夏自军：《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新思考》，《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② 颜旭：《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及对策》，《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

③ 张焱：《道器并重：当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3期。

④ 夏一璞：《互联网的意识形态属性》，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5，第66页。

⑤ 江涌：《国家安全体系建构的困境、挑战与忧思》，《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年第11期。

⑥ 侯惠勤：《坚定文化自信的理论自觉》，《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11期。

⑦ 赵欢春：《“总体国家安全”框架下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预警探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11期。

上述三个阶段所体现的研究成果将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重要意义的研究不断向前推进，而且紧跟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的变化而变化，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普遍意义强调多，特殊意义阐述少。很多学者将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等同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只论述了一般性的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意义，没有重点论述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意义。二是意义阐述维度较窄，大多停留在中国维度层面。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意义不仅与中国国家安全息息相关，而且与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相关、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进程相关，理应具备世界意义。三是还应该拥有一个时代维度的阐述，也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的意义，目前的研究成果中较少论及。

3. 互联网时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相关研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我国意识形态风险不断加大，挑战逐渐增多。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深入而不断予以重视和投入，尤其是近年来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不断改变着国家意识形态风险格局。目前关于风险挑战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是没有突出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从整体上分析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风险状况。这类研究成果也将互联网带来的新挑战寓于其中，既有传统因素的分析，又有新的因素阐述。如杨宏伟、王亚妮认为风险分为内部和外部两种情形，“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内部冲击：利益分化导致价值观念分化；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弱化；各种社会思潮乘虚而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外部挑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挫折使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动摇；全球化过程中西方资本、技术和产品的涌入，动摇了意识形态的基础；西方文化的输入，试图在内容上为主流意识形态

提供替代品”。^① 再如颜旭认为：“‘颜色革命’是最大的威胁；反主流社会思潮是最紧迫的威胁；党内消极腐败是最根本的威胁。”^②

第二种是针对互联网带来的影响，重点阐述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状况。如郑洁认为：“数据规模大，容易销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舆论导向；信息流动快，容易削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方式；技术更新快，容易挑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架构；思想多元化，易于冲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结构。”^③ 再如李俊卿、张译一认为，风险主要来自“互联网技术层面本身的严峻挑战；发达国家利用文化传播畸形意识形态渗透的风险；政治娱乐化、消费主义及各种错误思潮引发的身份感缺失和价值观模糊；网络舆论的开放性与自主性对意识形态造成压力”。^④ 还有的学者将网络空间特定时段出现的一些挑战意识形态安全的现象作为主要存在问题，如宋丽丹在《维护移动网络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一文中梳理了六大类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信息^⑤；李艳艳在《维护微博意识形态安全必须纠正的几种倾向》中提出了五种倾向^⑥；等等。

第三种是紧密联系互联网时代的影响，但不局限于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如陈坤、李佳认为，大数据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优势地位和意识形态生命力受到挑战；网络管控难度加大，意识

① 杨宏伟、王亚妮：《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探析》，《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② 颜旭：《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及对策》，《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

③ 郑洁：《大数据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机遇、挑战与对策》，《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11期。

④ 李俊卿、张译一：《互联网背景下我国意识形态表征、安全风险及防范》，《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年第10期。

⑤ 宋丽丹：《维护移动网络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红旗文稿》2015年第6期。

⑥ 李艳艳：《维护微博意识形态安全必须纠正的几种倾向》，《红旗文稿》2014年第23期。